



# 中国近现代史学 思潮与流派



(1840 — 1949)

上册

胡逢祥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840—1949)

上 册

本册著者 胡逢祥 张文建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全三册/  
胡逢祥等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469-6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1840-1949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105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

（全三册）

胡逢祥 等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6469 - 6

---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 680×960 1/16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5

定价：180.00元

# 总目

## 上册

### 绪论 / 1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第一节 晚清社会变局与经世学的复兴 / 25

第二节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 43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的外国史地探讨 / 61

第四节 蔚为风气的当代史著述 / 83

### 第二章 洋务思潮与史学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性质及其文化意义 / 101

第二节 “中兴史”和外交史的编纂 / 110

第三节 探求“富国强兵”的科技史和军事史著 / 122

第四节 走向世界的外国史地考察 / 129

第五节 光绪朝的元史学 / 140

第六节 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 / 165

###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 第一节 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开启 / 193
- 第二节 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 / 206
- 第三节 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 / 231
- 第四节 政潮起伏中的外国史研究 / 255
- 第五节 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著 / 273

###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

- 第一节 国粹史学的形成 / 309
- 第二节 国粹派的治史方法与学术成就 / 320
- 第三节 国粹派的“民族文化论”及其局限 / 330
- 第四节 国粹史学的巨擘章太炎和刘师培 / 338

## 中 册

### 第五章 现代科学实证思潮

- 第一节 从“科学”到“历史科学” / 365
- 第二节 科学方法热与西方现代史学的输入 / 395
- 第三节 科学化进程中的史学制度建设 / 420
- 第四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一：科学方法派 / 510
- 第五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二：古史辨派 / 555
- 第六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三：新考证派 / 581

### 第六章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史学

-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 / 695

第二节 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建构路向 / 706

第三节 新人文主义的史学实践 / 716

## 第七章 唯物史观思潮的初盛与社会史论战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史学意义 / 751

第二节 社会史论战及其影响 / 761

第三节 唯物史观史学潮流的初盛 / 856

第四节 《食货》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880

# 下 册

## 第八章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民族主义 / 927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史潮 / 946

第三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一：

禹贡派 / 974

第四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二：

战国策派 / 1009

第五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三：

民族本位文化派 / 1034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 走向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 107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 1106

第三节 古史研究及其分期讨论的新进展 / 1139

第四节 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 1214

第五节 中国通史体系的形成 / 1240

附录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 1258

附录二：主要引用文献及书目一览 / 1301

后 记 / 1336

绪 论 /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第一节 晚清社会变局与经世学的复兴 / 25

第二节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 43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的外国史地探讨 / 61

第四节 蔚为风气的当代史著述 / 83

第二章 洋务思潮与史学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性质及其文化意义 / 101

第二节 “中兴史”和外交史的编纂 / 110

第三节 探求“富国强兵”的科技史和军事史著 / 122

第四节 走向世界的外国史地考察 / 129

第五节 光绪朝的元史学 / 140

第六节 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 / 165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第一节 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开启 / 193



- 第二节 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 / 206
- 第三节 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 / 231
- 第四节 政潮起伏中的外国史研究 / 255
- 第五节 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著 / 273

####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

- 第一节 国粹史学的形成 / 309
- 第二节 国粹派的治史方法与学术成就 / 320
- 第三节 国粹派的“民族文化论”及其局限 / 330
- 第四节 国粹史学的巨擘章太炎和刘师培 / 338

## 绪 论

### 一、近代社会变迁与传统史学的转型

史学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学术，几千年来，它一直以“道统相传”的方式递嬗并加固自己，逐渐构筑起世界文化史上独特而根植深厚的传统史学体系，直到近代<sup>①</sup>，才在西学浪潮的碰撞激发下，卷入国际学术的潮流，开始了深刻的裂变和转型过程。

史学的兴衰递变，历来与社会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乱兴衰、民生的升降荣枯、王朝的盛衰存亡、疆域的分合消长，无不激起过史学的种种变化。但这些变化，都只是同一文化构体内的自我修复更新或层累堆积式的增高发展，而未能改变其基本的知识架构和自古以来相沿不替的文脉。然而，进入近代社会后，这一史学演变的惯性却被无情地打断了。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开始急速地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逐渐丧失，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日趋遭到侵蚀。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下，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则有了较前为快但却畸形的发展。而在文化上，因受时势激荡和逐步输入的西学——欧美近代思想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也出现了一系

---

① 在我国，“近代”这一概念一度特指 1840 年至 1919 年间的时段，此后至 1949 年则称“现代”。现在所说的“近代”，一般包括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整个时间段，但在涉及学术特征的讨论时，考虑到 1900 年前后差异较大，为对两者有所区分，本书对 20 世纪上半叶这一与当代学术连接更为密切的时段，往往采用“现代”这一表述概念。

列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变动。史学的走向,同样如此。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史学,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从其性质和运作方式看,都未能越出传统学术的藩篱。只有在近代,其发展主流才第一次真正显示出日趋挣脱旧学羁绊而向着新型文化形态转化的趋势:历史研究的目的,渐由为历代统治者提供“资鉴”而转向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及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服务,要求编写“民史”、“国史”、“社会文明史”和“人类资治通鉴”以取代“帝王教科书”的呼声日高;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居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唯古是从观念不再为许多人所崇信,而肯定社会变化进步的历史变易观、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日益传播流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格局渐被打破,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一些与现实直接相关的课题更成为史学界探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治史;在史书体例、文字等表现形式上,也日趋大众化和通俗化。新文化运动以后,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国内各派新史家共识。

就学术自身的性质而言,中国史学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突出标志,便是逐步改变在传统学术中作为封建法定政治学——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走向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独立化。

先秦时期,史为包举各种人类知识的总称,史官代表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文化知识。故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sup>①</sup>自汉至清两千年间,总天下学术为一的状况虽不断有所改进,然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权威起见,运用政治权力,定儒家经学于一尊,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整个传统学术的层次结构和主从关系,使史学与其他学术均降为经学的附庸(尽管史学受经学束缚的程度各时代并不相同,但此种基本定势,始终存在)。《汉书》以后历代官修正史的倾向自不消说,即私家修史,亦多有以“载道”和“羽翼经训”相尚者。事实上,在这一文化体制中,统治者不仅严格掌控了当代史的纂修权,即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0页。

一般民间私人的史学活动也很难越出其意识形态的牢笼之外。宋以后，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经学的变种——理学日益贯注于史学。如范祖禹的《唐鉴》，因吸取了不少理学观点，而大为程颐称赞，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sup>①</sup>朱熹更是力倡：“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浙东学派的吕祖谦因提倡读史，稍稍偏离了这一轨道，便被他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sup>②</sup>其《通鉴纲目》之作，即是这种以经贯史主张的实践。旧史学对经学的依附特性，一方面形成了崇尚“春秋笔法”，讲求“经世资治”的深厚传统，同时也限制了它本身的独立发展。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王朝帝制走向最后崩溃，作为其政治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的经学，也渐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之地而趋于衰落。于是，史学始得逐步挣脱经学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种学术演变的新动向，在近代一些进步史家的论述中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如近代早期的龚自珍，在当时一般士人尚心营目注于经学之时，便针对“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流俗之见，力倡“尊史”之说，以为今日之所谓“经”，不过是古代之史，史学乃关系国家盛衰之说，故“欲知大道，必先为史”<sup>③</sup>；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更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梁启超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sup>④</sup>马叙伦也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史者，所以纲维群物而条具事理者也。是故一朝之典故，一代之政俗，而盛衰之由、沿革之数、民族之原、教化之本、人物之繁、食货之重，莫不史乎系之。”<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与宋明以来某些学者提倡的“六经皆史”说，虽同是要求提高史学的地位，出发点已大为不同。后者之重史学，大多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体会的，即认为经史作用

①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3、439页。

② 参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1页。

③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⑤ 马叙伦：《史学存微》，《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相同，唯表达“道”之方式各异而已，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sup>①</sup>。“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sup>②</sup>其意仍在加强经史一体化，或将史学纳入经学的精神轨道，以史补经，使当时的政治理论得到新的充实。而史学之在近代受到高度重视，恰恰是以承认其学科的独立性为前提的。

如王国维在1904年就提出，学术研究应超越利害关系之外，不应视为道德、政治之手段，其所求乃“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如专重一时之功利，“求以合当世之用”，有时反会自失其价值。<sup>③</sup>章太炎也认为：“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sup>④</sup>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这一观念在学术界更为滋蔓。如顾颉刚认为：“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sup>⑤</sup>甚至连一向十分强调以学术经世的梁启超这时也表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sup>⑥</sup>

这些议论表明，两千多年来传统学术结构层次的坚冰已开始被打破。它的实质，显然不在于一般地否认史学的社会功用，而是要求从根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李贽：《经史相为表里》，《焚书》卷五，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③ 王国维：《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卷一，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④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7页。

⑤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

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1页。

本上改变其充当帝王政治御用工具的传统，摆脱经学的束缚，而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发挥其社会作用。如王国维在提出前述看法的同时就指出，学术研究首应冲破儒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sup>①</sup>。他还要求改变那种“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sup>②</sup>的治学宗旨，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sup>③</sup>应当看到，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当时的提出，对于克服旧时代学术过分依附于帝王政治和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确立我国现代学术形态和健全史学的学科独立发展机制，实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正”，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意义。当然，史学在近代的学科独立化，是经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发展才完成的。大抵近代前期，这种倾向只是不断加强，但经史仍时相混杂，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魏源、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同时又是经学家，其史学思想往往带有很浓的经学门户色彩，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旧经学淡出历史舞台，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发展。

这里，应特别指出，传统学术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虽然涉及所有的学科领域，但对于各学科来讲，其变动的程度和内涵实不尽相同。大体来说，有三种情形：一是本土原无此学科而完全从外部引入者，如社会学、人类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等；二是本土学术中虽有一定根基，但需完全按新形态重新组合者，如考古学等；三是传统学术中原有此学科且本身框架较完备，经注入新理念和建构新体制而实现其改造者，这类学科最少，史学即其中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中最具典型的一种学术，而其本身极为深厚的学术凭借，也必然要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学东渐的直接刺激下开始的，并表现出一定的“西

① 王国维：《奏定经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卷一四，第36页。

② 王国维：《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卷一，第132页。

③ 王国维：《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全集》卷一，第125页。

化”的趋势，却绝非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自身内在因素尤其是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相当明显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史学现代化的路径看，一般认为，西方是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观作为摆脱中世纪学术依附于神学和开启现代史学独立性的新契机的，如英国当代史家浦朗穆（John Harold Plumb，1911—2001）就说过：“至文艺复兴以降，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之往事，为了解而了解，非为宗教，非为国运，非为道德，亦非为神圣化之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之真相，而冀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之社会变迁轨迹。此为一方之发展。”<sup>①</sup>但在中国，虽然20世纪初王国维便发出过类似的呐喊，但应者寥寥。新文化运动时期，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等观念的人似乎多了起来，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且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意识。不仅如此，在传统史学转型的一些重要关头，学术界强调的也往往是经世意识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风气之变就是以龚自珍、魏源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开始的；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开创现代史学的名篇《新史学》中，开篇就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sup>②</sup>打出的同样是强化史学社会经世功能的旗号——当然其服务对象已从旧史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转向社会进步与国民。

又如，西方文化走向近代是以文艺复兴开其端的，中国自晚清起，也有人憧憬过“文艺复兴”的出现，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和《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一再称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的特征，“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sup>③</sup>。邓实更认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术之盛，足与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学术相相颉颃，故振兴民族文化，亟应复兴先秦古

① John Harold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69, pp. 12-13.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卷一〇，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9页。

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如此,“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sup>①</sup>实际却不然。纵观历史,无论东西,凡文化上的大变局,尤其是一种质变性新飞跃的产生,除了社会本身提供的物质条件外,大多是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相互撞击和融合的结果。文艺复兴中被重新发掘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西方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文化本属不同传统和系统的文明,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这两大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撞击中破茧而出的。而先秦非儒诸子学说虽然在汉以后的文化史上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却从未像古希腊罗马学说在西欧中世纪那样遭到过长期湮没无闻的命运。事实上,诸子学说不仅与儒学属同一文化系统和时代的产物,且长期维系着主辅共存、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兼容的文化格局。提倡“复兴古学”和恢复诸子应有的学术地位,固然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却难以导引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现代文化与学术的巨变,绝非由本系统内不同派别冲突和整合酿成,而乃本土和西方两大不同系统文明相互摩荡交汇的产物。

其次,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这一历史学运作的核心层面看,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似乎也是尾随着西方的某种理论或方法体系展开的,具体来说,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以宗奉西方实证论的新考证派为主流,后半叶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统天下。但现在看来,此种笼统的结论应当重新加以审视。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外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基本史实的认定,二是对历史的理解或解释。前者通常包括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证排比,为整个历史研究的基础;后者包括对历史因果关系及其是非得失的分析和意义的追寻,形成历史研究的认识升华。由此两个层面考察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应当看到,在史料和史实考证的基础工作方面,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倡导的所谓“实证史学”其实并未改变清代以来考据学基本方法和主流路

①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类似的言论,还可参见于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民报》1907年第8号)、许守微《论国粹无阻碍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年第7期)、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1907年第26期)。



向，不少人按照胡适的说法，认定清代朴学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以致他们所从事的实证史学用的是西方的术语，走的却基本是乾嘉以来的传统史学路子，或者仅仅是这一路向的拓展。这一点，即使是主张按近代自然科学标准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傅斯年也不否认，他公开宣称：“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因为“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又说：“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sup>①</sup>对于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其亲近的一些朋友也以为“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sup>②</sup>。而胡适晚年，竟向何炳棣自承：“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乃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sup>③</sup>胡适和傅斯年都是如此，遑论其他人。自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运用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从事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总的来说，并不占主导地位。

而在历史解释层面，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走的明显是西学路子，从20世纪初进化论的流行，到五四以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历史解释系统的流入，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属于中国传统历史解释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② 唐德刚编校译注：《胡适的自传》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142页。

③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